

李敖
大合集

5
胡适研究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李敖
大合集

5

胡适研究

胡适研究
胡适评传

李敖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,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,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,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,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,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,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,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,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,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,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,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遵循有关规定,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;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;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,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,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,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,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2 | 李敖大全集(卷5)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2009年12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胡适研究》(1—188)

前记/3

播种者胡适/10

为《播种者胡适》翻旧帐/44

三人连环传/146

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/158

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/161

关于《胡适文存》/169

评介《丁文江的传记》/178



目录

《胡适评传》(189—380)

关于《胡适评传》/191

楔子/194

可怜的县太爷(1841—1895)/196

可怜的小寡妇(1873—1918)/216

半个台湾人(1891—1895)

——胡适也是阿海吗? /224

被拧肉的时代(1895—1904)/243

“努力做徽骆驼”(1904)/262

“依跟我来”(1904—1906)/276

《竞业旬报》(1906—1908)/294

少年诗人(1907—1909)/331

“无忘城下盟”(1908—1909)/345

从逛窑子到上北京(1909—1910)/361

本

秘

胡适研究

教

前记

胡适先生死在1962年2月14日。在他死的那天晚上3点钟，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：

“别看他笑得那样好，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。”

在《播种者胡适》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。今天傍晚，这个“寂寞的人”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：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，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。在天路的历程中，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，——他是一个战斗的人，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！

我想到去年10月9号给他的信。有一段说：

“我觉得你有点老惫，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，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，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。”

在我这封信前两天，他写信约我去南港“玩玩”；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，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。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，也没见到我去“玩玩”，他就倒下了！

两年十个月来，我一直没见到他，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，——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，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！

这几段文字写好后，我并不打算发表，所以我改写了一篇《胡适先生走进

了地狱》，发表在3月1日的《文星》杂志里。

* * *

胡适先生走进“地狱”后，眼看就快两年了。两年来，真可说是一个既“冷漠”又“吵闹”的局面。

何以说“冷漠”呢？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。他们这批人，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、良朋、门生、干女婿，是“蟠龙大花瓶”的赠送者，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，是“胡适合会”的“标会”者……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，几乎在“尸骨未寒”的当儿，他们就变成了“不认得耶稣”的“彼得”。《新约》路加第二十二章里，有这样的故事：

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。彼得远远的跟着。

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

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说：“这个人素来也是同(耶稣)那人一伙的。”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：“女子！我不认得他！”

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：“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”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！我不是！”约过了一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说：“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”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！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！”

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(耶稣)转过身来看彼得。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——“今日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

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！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1900年，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——胡适的亲爱的“彼得”们，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，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：彼得还会羞惭痛哭，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，可是他们呢？他们都不会，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“告朔饩羊”，对遗照三鞠躬以后，一哄而散，坐车回家。

记得胡适死后不久，胡虚一先生在《民主潮》第十二卷第六期(1962年3月16日)里，翻译了一篇《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》，他在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：

这几年来,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搞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,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“花边新闻”的采访对象,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,一直是孤寂的!一直是忧愤的!为什么?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象得到的。近几年来,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,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“自由民主”的可悲人物!他的声誉,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“自由民主”糟蹋得不成样子了!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,在他们的谈话中,充分流露出他们“对胡适的失望”。虽然如此,可是“围剿胡适”之浪潮,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。而更可“悲”者是,“桃李满天下”的胡先生,他的门生高足,际此“围剿胡适”的风暴声中,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,除了一个不相干的“青年小子”李敖君挺身而出说几句外,很少有人挺身而出为“胡适思想”做一是非辩的!你想: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?

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,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。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,在这两年里头,胡适的“门生高足”更是安静得可爱了,他们安静地看着,看着那个“不相干的‘青年小子’李敖君”来开创一个“吵闹”的局面。

* * *

所谓“吵闹”,应该从头说起。

1961年的年底,我应《文星》杂志编者的邀请,为他们写了一篇《播种者胡适》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,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,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,一个圈圈是“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”;一个圈圈是“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”,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;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(任卓宣)先生和郑学稼先生,大家打作一团,十分热闹。

在《播种者胡适》发表以后,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,例如香港《自由报》的社长雷啸岑先生(马五先生),《中国学生周报》中的若兰先生,《展望》杂志中的孟戈先生,台湾《作品》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,《民主中

国》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,《文星》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、东方望先生、田尚明先生……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。此外在口头上面、书信方面,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。

当然相对的,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,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“三大‘评论’”:《政治评论》《民主评论》和《世界评论》。在这些刊物上,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,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。对《播种者胡适》的问题,我只写过一篇《为〈播种者胡适〉翻旧账》的文字,来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,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,我一概不理。即使叶、郑两先生,我也只答复一次,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,我也懒得辩驳了。

我为什么不再答复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?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,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,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。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“基本思路”(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)上一刀扎下,从“基本思路”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“心理运作”(mental operation)的过程。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后,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“前期快感”(fore-pleasure)是什么主义以后,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:“算了吧!放他们去吧!”

* * *

谈完了“冷漠”和“吵闹”两个局面以后,我觉得我该谈谈“播种者胡适”本人。我先抄《世界评论》第十年第五期(1962年5月16日)中,周伯达先生的《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》里的一段话:

《文星》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《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后校改》一文说:“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《康南耳传》,一张便条,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:‘校改本,送给徐高阮、毛子水、台静农、姚从吾、台大图书馆、成功大学图书馆、李敖、蒋孟邻、沈宗瀚、钱天鹤。’先生吩咐我: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后,请你照我最后的校本改正后,分送给他们。”据胡颂平先生说: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。从这件小事,我们可以看出:李敖这位年轻人,在胡适之先生心

目中的分量,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,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,是先写李敖,而后写蒋孟邻的。关于这件小事,我只能做如下推断:其一、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;其二、是李敖所作的《播种者胡适》(本年1月1日)及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(本年2月1日)这两篇文章,深为胡适所赏识。否则,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;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,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。果真这样,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?我相信今后注重考据的人,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。

这段令人发笑的“推断”,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。其中有一点,所谓胡适“深为”“赏识”我这篇《播种者胡适》的问题,我觉得大可不必请“今后注意考据的人”来“考出这个秘密”了,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。杨树人先生在今年2月1日的《文星》第七十六期上,发表了一篇《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——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》,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《播种者胡适》的不高兴:

一天下午,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,商量一件公事。我很快的结束谈话,好让他静养。可是他止住我离开,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,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。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,我急忙设法推开,我说:“先生,我现在的范围很窄,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,我就懒得看它!”

“不,你应该看看这一期。”他一面说,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,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划。“你看,这说的什么,这样的轻佻浮薄!再看这儿,简直瞎闹。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!”他一面指给我,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划出来。情绪已是颇不开心。

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“李敖这位年轻人”的“深为”“赏识”吧?

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,胡适先生死后,他整理遗稿,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《播种者胡适》后写给我的信,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“妥为保管(封锁?)”了,所以直到今天,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。

我知道我这篇《播种者胡适》会三面不讨好：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，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，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，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，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，不计其他。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，他的所作所为、他的真面目，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，这种影响，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账。基于这个理由，我除了写一部《胡适评传》外，决定再印行这本《胡适研究》。

* * *

这本《胡适研究》，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：第一篇就是《播种者胡适》，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，一篇“祸首”。第二篇是《为〈播种者胡适〉翻旧账》，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，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，正是胡适“遽归道山”的日子，胡适生不及见，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。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，可是限于篇幅，我只能挑出八篇，作为附录。

第三篇《三人连环传》，是写梁启超、胡适、徐志摩三个人的。这种连环写法，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。

第四篇就是《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》。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，最为某些人所欣赏，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、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义，真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。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，在报上痛骂我，我只好把这种批评，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后，作为附录。

第五篇《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》，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，可算是《胡适评传》中的一小节，这段历史，我在《胡适评传》中还要细细写到它。

第六篇《关于〈胡适文存〉》，是一篇“特殊的”书评。最初登在《大学杂志》，后来删了一部分，改登《自由中国》。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章。胡适先生后来告诉我说：“雷震特别写信给我，推荐你这篇文章。”

第七篇《评介〈丁文江的传记〉》，也是一篇书评。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，我本已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，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，我颇为失望，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，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，如此而已。总之，对《丁文江的传记》这本书，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。

* * *

编完这本小书以后,我感到一种轻快。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么“深厚的世交关系”,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《学宗》(第三卷第二期)中所称的“被胡适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”,但胡适跟我之间,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。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,不过那也许要在“天下太平”之后。现在我只把这本《胡适研究》先印出来,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,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“老朋友”。

1964年2月6日在台北

播种者胡适

山下绿丛中，
露出飞檐一角，
惊起当年旧梦，
泪向心头落。
对他高唱旧时歌，
声苦无人懂。
我不是高歌，
只是重温旧梦。

——胡适《旧梦》

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件大事。在民国六年的1月里，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到了北京大学，这个老头儿就是蔡元培。他当时要物色一个文科学长，他的朋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，杂志的名字叫《新青年》，那时候刚出了十五个月。

陈独秀一到北大，立刻跟一些有新头脑的教授合了流，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，还有那要排斥四十岁以上老家伙的钱玄同。这些年轻的教授们颇有“万事俱备”的条件，他们想施展，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、主要的方向。在摸索中，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、爽快了、豁然开朗了，他们兴奋得互相告诉，他们

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。——那是东风！

* * *

东风来了，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。民国六年的9月里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二十六岁的新教授，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，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，——他找到了，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，他立刻喜欢了这个“旧学邃密”“新知深沉”的年轻人。

北京大学热闹起来了！梁山泊上又添了几条好汉，他们是：胡适之、刘半农（复）、周豫才（鲁迅）、周岂明（作人）……

北大添进了新血轮，北大开始蓬勃了！

七年1月，《新青年》以新面目出版了，六个教授轮流编辑，想开始为中国奠定“非政治的学术基础”，培养一个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。那一两年间，他们最大的成绩当然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。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，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，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；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“俗文学”变成了正宗的“白话文学”，正名为“国语文学”；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；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，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。

乍看起来，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，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，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，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断丧精神的自由，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。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，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。胡适首先看到这一点，他立刻把消极意味的“八不主义”改成了肯定语气，他告诉人们：

- 一、要有话说，方才说话。
- 二、有什么话，说什么话；话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
- 三、要说我自己的话，别说别人的话。
- 四、是什么时代的人，说什么时代的话。（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）

非常明显的，这四行句子的精义所在已经不止于文字方面了，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新的思想的新方向。

民国七年的6月里,《新青年》出了《易卜生专号》,胡适写《易卜生主义》,初次宣扬那个“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”,他借着西方近代一个最有力量的人文人的笔,借着简明有力的白话文字,鼓吹“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”:

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,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;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,我们偏要歌功颂德;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,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!却不知道:若要病好,须先认有病;若要政治好,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;若要改良社会,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。

在那篇长文里,他鼓吹“说老实话”,攻击“腐败家庭”、攻击“死板板”的法律、攻击“处处反乎人情”的虚伪宗教、攻击“许多陈腐的旧习惯”——道德、攻击社会对特立独行的“捣乱分子”的压迫、攻击他最恨的“那班政客”。他一下子攻击了这么多传统的丑脸,所用的,只不过是一个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杆新枪。

很快的,非常明显的,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,文学革命很快的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,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。在短短的两三年间,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,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,创立了新式标点,宣传了《不朽》论,介绍了实验主义,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,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,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,最后印出了《尝试集》,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,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,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。

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,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,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,每个运动都以《新青年》为源头。这时候,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。

在南方,一位深思远虑的革命领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。他肯定了这“一二觉悟者”所引起的“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”。他在民国九年写信给海外同志,告诉他们“欲收革命之成功,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”。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,还为其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儿——“新文化运动”。